

客观、专业、洞察

美国财税动态

月刊

MEIGUO CAISHUI DONGTAI Monthly

2017 年第 8 期（第 2 卷第 8 期）



主办:



美国财政与经济研究所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简介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MEIGUO CAISHUI DONGTAI Monthly）是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美国财政与经济研究所编辑，由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地方税务局协办，专业提供美国当前财经运行动态、政策动向与思想趋势的期刊。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MEIGUO CAISHUI DONGTAI Monthly）的办刊宗旨是，秉持学术中立，以专业的视角，客观详实、及时准确、动态全面地反映美国财政政策和运行、趋势、财经新思想及理论最新进展，政策性与学术性并重。

编辑出版《美国财税动态》月刊（MEIGUO CAISHUI DONGTAI Monthly）的目的，以期为国家财经治理、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财政政策布局，提供科学资料和决策依据，为我国财经理论与政策科学的研究、教学提供参考资料，并为发展外国财政学术积累基础数据并提供支撑。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MEIGUO CAISHUI DONGTAI Monthly）每月25日前后在上海出版。



刊首语

中国是当代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今后的几十年，中美两国国力交替将是重要的时代特征之一，而美国当代史上几个重要关节点值得在此提及，其中包括《1965 年社会保障法修正案》建立的 Medicare 与 Medicaid 计划，1973 年美元退出金本位、石油与美元挂钩、廉价美元泛滥全球，1980 年代末冷战结束、2001 年以来连续不断的反恐战争，以及 2007~2009 年经济大衰退导致联邦债务在 10 年内翻番等。这些事件，一是强化了美国的国际霸权与国内治理能力，导致联邦政府国际、国内义务不断增多，二是改变了联邦财政收支结构，财政收支失衡，越来越依靠经常债务筹资手段治国，三是推动了全球化迅猛发展，但残破的联邦财政税收制度最终使它自己逐渐败下阵来；尤其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加入 WTO 之后，与美国展开了激烈的政治与经济和平竞争，都加速或抵消着美国上述三种趋势。特朗普总统正是在美国遭遇全球化失败背景下上台的。

特朗普试图改革联邦治理体制使美国重新伟大起来。美国确实是世界上伟大的国家之一，它有极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有强大的国力做基础，又没有其他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光彩的殖民史包袱，加上战后主导并建立的国际治理体系直接服务着美国的霸权利益，长期居于国际政治经济“食物链”的顶端。然而冷战结束后的近三十年来，美国在享受和平红利的同时，在体制创新方面逐渐落后，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财政制度以及社会政策都已落伍。以财政预算制度为例，联邦政府的年度预算越来越失去严肃性，利益集团操控财政支出能力极其强大，为了满足食利阶层越来越庞大的需求，在社会政策方面不得不通过加大支出方式掩盖社会矛盾，所以财政包袱愈加沉重，而财政收入结构中百分之四五十来自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障税，作为真正纳税主体的企业，每年缴纳的所得税却微乎其微，肥了很少一部分大财团与富翁。可见体制的扭曲与利益集团控制才是导致美国国力下降、在全球化进程中遭遇失败的病根。联邦政府不解决政治、经济与社会体制问题，特朗普总统将很难实现使美国重新伟大起来的誓言。

对特朗普改革的挑战来自现行体制，而非中国。近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宣布，美国将正式发起对中国的“301 调查”，重点是确认中国企业是否“涉嫌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和强制美国企业进行技术转让，以及美国企业是否被迫与中方合作伙伴分享先进技术”等，美国的单边行动必然损害中美经贸关系。根据“301 条款”，美国有权对其他国家所谓“不公平”贸易进行调查、协商，最后通过提高关税、限制进口、停止有关协定等措施施加报复。三十多年来，美国频繁使用过“301 调查”应对与日、韩的贸易摩擦，而近年来“301 调查”主要通过特别修正案，用于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尤其是在 WTO 条款之外的政策领域。实际上，针对中国的“301 调查”选错了对象，其本质是为特朗普国内改革政策失败寻找国际目标，转移国内矛盾，必将遭到中国的强烈抵制，同时数以千计从中国市场或从进口中国商品获利的公司与厂商，也反对特朗普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政策，而美国相关产业的竞争力也绝不能通过贸易保护政策获得发展，因而我们完全可以预见，这次“301 调查”必定失败。

美国最终仍需调整政策回到全球化立场。美国由于其历史传统，国内的保守主义、孤立主义思想常常阴魂不散，沉渣泛起。回顾奥巴马时期提出并强力推进的 TTP 以及 TTIP 等政策，都是试图在主要由美国主导的 WTO 体制之外另起炉灶，再到特朗普总统念念不忘的墨西哥墙工程、重新谈判 NAFTA 惹恼加拿大，最后到今天仍未签署 G20/OECD 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项目关于《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多边公约》，不但伤害着美国的国际形象，也将对美国的全球与国内政治、经济利益造成实质伤害，实际都是搬起石头自己砸脚。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李超民）

2017 年第 8 期《美国财税动态》月刊目录

《华盛顿政治经济》

中国 A 股加入 MSCI (1)

美气候保守势力施压特朗普 (2)

《利益集团与联邦财政》

OMB 预算蓝图强化行政管理 (4)

OMB 删繁就简放松监管 (5)

HASC 反对 2017 财年接续决议案 (6)

2018 年国防预算将超 7000 亿 (6)

保守派压特朗普大砍环保预算 (7)

《利益集团与税收征管》

Kautter 任财政部税收政策助理部长 (8)

众院筹款委员会函询 IRS (8)

企业税 15%与属地税制是特朗普税改核心 (9)

特朗普税改计划自圆其说 (10)

特朗普税改纲要引两党对立 (11)

筹款委员会谋求一统税改 (11)

共和党起草税改蓝图 (12)

国会举行税改听证 (12)

众院听证企业税改 (13)

税收基金会鼓吹全部费用化政策 (13)

众院共和党需调整 DBCFT 计划 (16)

边境调节税在筹款委员中遇阻 (17)

税收联合委员会调研边境调节税提案 (19)

边境调节税缺陷调整及意外后果 (20)

《联储与货币政策》

众院新法案替代《2010 年多德-弗兰克法》(20)

联储在空中盲飞 (21)

日本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启示 (22)

《美国财经数据》

两成美国人忧心经济恶化 (23)

美联邦政府 2017 年 7 月预算回顾 (23)

《华盛顿政治经济》

中国 A 股加入 MSCI

编者按：据路透社 2017 年 6 月 21 日报道，摩根士坦利资本国际指数的编制机构明晟公司（MSCI）宣布，拟于 2018 年将中国 A 股 222 只股票纳入 MSCI 新兴市场指数。据分析，在纳入这批股票初期，此举有望吸引 170~180 亿美元进军中国市场。纳入计划拟分为两步走，分别于 2018 年 5 月以及 8 月先后实施。国际投资界对 MSCI 这一历史性决定正面评价较多。A 股谋求加入 MSCI 已三年，但 MSCI 表示，全部 A 股股票纳入 MSCI 指数尚无明确时间表。

中国股市国际化进程近日取得重大突破。在历经漫长的加入 MSCI（简称“入摩”）进程后，A 股股票终于于 2017 年 6 月获准进入 MSCI 新兴市场板块，此举堪称国际投资界的里程碑事件。这是总部设在美国的著名指数编制机构 MSCI 在 2017 年 6 月 21 日宣布的。在 MSCI 对其他国家股市进行评审方面，阿根廷虽已在前沿市场板块经营多年，最终仍未得到批准升级，进入新兴市场板块，不过，MSCI 表示，未来将针对沙特阿拉伯股票，对其“入摩”申请，展开投资者咨询，这一消息颇令众多投资者意外。投资者认为，中国 A 股成功“入摩”，标志着中国政府取得了关键性胜利，因为在过去几年，北京一直坚定地致力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

A 股入摩颇受关注与好评。道富全球投资管理高级常务董事、亚太投资主管凯文·安德森（Kevin Anderson）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中国作为超级经济体，就其规模与重要性来说，现在是载入史册的一刻”。“这一决策历经诸多磨难，我们期待已久，除了它的象征意义外，还将切实推动资本与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券商们认为，MSCI 接纳中国“入摩”的决定一直倍受期待，其利好效应此前已被市场所放大消化，在正式宣布这项决定时，引发了部分蓝筹股获利抛售，而蓝筹股价格已在经历了 2017 年的强势回升后，达到高位。沪指高开幅度仅有 0.3%，随后飘绿，最终强势反弹，报收上涨 0.5%。大盘蓝筹 CSI300 指数摆脱获利抛售不利局面，报收上涨 1.2%，迎来一年半来最高涨幅。

MSCI 与中国监管机构的入摩谈判长达四年。MSCI 与中国监管层以及国际投资界，共同商讨是否将资产总量约为 1.6 万亿美元、以人民币为主导的中国 A 股纳入 MSCI 新兴市场指数体系，但由于 A 股市场严格的准入条件限制，一直被排除在 MSCI 指数体系之外。明晟公司鉴于中国在推动市场开放方面取得的长足进展，最终宣布将 A 股 222 只大盘股纳入 MSCI 指数。拟纳入 MSCI 指数的主要是金融与工业企业，其中许多是国有企业。据金融服务机构瑞信统计，在 222 只拟纳入 MSCI 指数的 A 股名单中，50 只来自金融板块，其规模权重达到 36%，44 只来自工业板块，规模权重占比 16%。但拟“入摩”的 A 股仅占 MSCI 新兴市场指数权重的 0.73%，MSCI 计划分别于 2018 年 5 月与 8 月分两步纳入这批股票。

此举将有利于中国吸引更多外资。MSCI 管理层认为，在纳入 A 股方案的初始阶段，中国市场有望吸引 170~180 亿美元全球资金，而从长远来看，假如 A 股股票全面“入摩”，流入中国的外资规模有可能超过 3400 亿美元。但是，MSCI 指数管理研究部门的全球主管利布里奇（Sebastien Lieblich）拒绝透露 A 股整体“入摩”时间表。利布里奇说，A 股整体“入摩”进程，取决于中国方面改革计划的继续实施进程。Sebastien Lieblich 希望，继续看到中国进一步放宽资金从市场撤离的控制，并采取措施，限制频繁地停牌、复牌，“这真的要取决于中国相关各方的努力，他们才是决定性因素。因此，关于中国 A 股全面纳入 MSCI 的任何具体时间表，我们很难明确表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 MSCI 的决定表示欢迎。近年来,该委员会对许多关键性改革一直在实施监管。中国证监会发表声明表示:“中国 A 股纳入 MSCI 指数,符合国际投资界必然需求,反映了国际投资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向好以及金融市场稳定的信心”。

MSCI 近期放宽了该指数准入标准。2017 年 3 月,MSCI 对中国 A 股放宽了准入标准,但将建议纳入的个股名单从 448 只减少到 169 只,此举旨在敦促中国解决对资金撤离 A 股市场监控过严、停牌与复牌过于频繁的问题。2014 年,中国发布“互联互通”机制,并于当年 12 月大幅扩围,此后外国投资者即开始通过该机制,方便地进行上述 169 只大盘股股票的交易。除了这批多达 169 只大盘股外,MSCI 还选择了 53 个境外投资者更为熟悉、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内地股,拟一并纳入 MSCI 指数。截至 2017 年 5 月,在境外上市的中国企业的新兴市场指数权重已达 28%,再加上在中国境内的个股,未来在 MSCI 新兴市场指数的权重将达 40%。A 股包括沪深两市总价值约为 7.5 万亿美元,仅次于纽约股市和纳斯达克股市,位居世界第二大市场。

黑岩集团已为 MSCI 的决定进行背书。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黑岩集团(Black Rock Inc.)亚太区主席、集团最高管理层主要成员之一斯多克(Ryan Stork)声明指出:“我们坚信,将中国股票引入主流投资市场,必将使我们的客户受益”。但阿根廷在 MSCI 市场升级失败则意味着,它只能继续在 MSCI 体系中规模较小的前沿市场板块中“苦熬”,尽管阿根廷股票早在 2009 年就已纳入该板块。另外,尼日利亚也将留在前沿市场板块,而且还可能被降级为“脱机”状态。

(摘自 China shares get MSCI nod in landmark moment for Beijing, <http://www.nasdaq.com/article/china-shares-get-msci-nod-in-landmark-moment-for-beijing-20170621-00151>, 2017 年 6 月 21 日,由谢宗炜编译)

美气候保守势力施压特朗普

编者按: 近期美国共和党保守势力喉舌 *The Daily Signal* 声称,2016 年签署的气候变化协定(即《巴黎协定》)对美国有害无益,更糟糕的是,奥巴马当局谋求加入《巴黎协定》未经国会讨论,是有关美国重大法律问题的单方面“行政协定”。促使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特朗普总统即可获得双重胜利,既能稳健地推进国内经济政策,又强化了对法治的尊重。

美国签署《巴黎协定》代价很大。2016 年 4 月 22 日,美国与其它 170 个国家共同签署了《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以“对抗气候变化,并适应其影响”。这一国际性举措要求缔约国,承诺将其能源工业从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的化石燃料,转向诸如风力和太阳能等再生能源。不幸的是,正如传统基金会专家的文件记载的,美国颁布符合《巴黎协定》设定的法律基准,可能只获得“象征性”好处,却会付出更多就业机会,以降低家庭收入、降低工业效率为巨大代价。

一、签署《巴黎协定》的代价

《巴黎协定》到底要做什么?该协定设定的目标,是将全球变暖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的 2 摄氏度以内,由缔约国承诺,通过“脱碳”经济,显著降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目前,美国及其他国家约 80%的能源需求,依赖含碳的天然资源,其中主要是煤炭、天然气以及石油。如果美国按照奥巴马当局的提议,颁布符合《巴黎协定》精神的法律,将削弱国内含碳工业,抬高能源成本,损害本国工人和消费者利益。正如传统基金会经济学家所说,《巴黎协定》对美国经济和人民生活质量影响巨大。它将导致未来 10 年内,美国的电力开支增加 15~20%,减少工作岗位 40 万个,以四口之家为例,家庭总收入将减少 3 万美元以上,国内生产总值损失将超过 2.5 万亿美元。然而,这一切却不能产生任何环境效益。

二、总统的行动

特朗普反对《巴黎协定》。幸运的是，特朗普当局正在试图阻止上述可怕的经济后果，或仅仅是未按《巴黎协定》要求，颁布严厉的环境监管法律后果。庆幸的是特朗普总统在3月28日签发了行政命令，要求行政机构审查那些可能拖累国产能源开发、利用的现行法规，适度中止、修改、撤销那些超出保护公共利益必要限度，或其他符合法律规定、却过度拖累国产能源开发的现行法规。

然而特朗普面临威胁。尽管特朗普的行政令鼓舞人心，合理的监管政策却将面对潜在严重违法风险，除非美国正式退出《巴黎协定》。原因何在？因为该协定第4.2条规定，“各缔约方应编制、通报并保持它打算实现的下次国家自主贡献”。奥巴马当局承诺，美国的自主贡献是力求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到2025年美国国内排放水平比2005年低28%。

现在美国民间组织有可能起诉联邦政府。特朗普当局主张改变奥巴马当局的环境监管政策，其中包括中止、修改、不颁布法律，此举将导致美国违背对《巴黎协定》的承诺。因为，根据该协定第4.11条，允许缔约国“根据《巴黎协定》，作为《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的指针”，随时调整现有国家自主贡献水平，“以加强其力度”。例如，环保组织可能以原告身份，主张环境监管救济并没有“强化”奥巴马当局的承诺。相反，原告认为，此举可能削弱了美国的承诺，进而违反了《巴黎协定》。

三、《巴黎协定》产生的法律风险

这样做现实吗？甚至连环保组织都认为，此类诉讼对于联邦法律完备的美国而言，毫无法律依据。这也就是为什么《巴黎协定》的条款不是“自行执行”的，即政策条款无法自动形成约束美国的法律义务，而需要通过国会立法，才能生效。此外，正如联邦法院所认定的，民间组织缺少法定语言，不具备提出对国际协定诉讼的“资格”，而《巴黎协定》恰巧缺少这种法定语言。

然而这并不能阻止特殊利益团体提起诉讼的尝试。近期司法实践表明，即使是毫无法律依据，对特朗普新政的起诉也可能胜诉。原告只需找到任何一位低级联邦法院法官，以及任何一个有利于上诉的法院，只要他们愿意无视基本法律准则，推动理想的政策目标，联邦政府的政策意图就可能会被扼杀在摇篮中。例如，最近，多位联邦法官无视法定语言和最高法院判例，阻止了特朗普总统的行政命令，允许阻止对向继续从恐怖主义安全港的中东和非洲来美旅行。正如传统基金会学者斯帕科夫斯基（Hans von Spakovsky）指出的，上述判决毫无原则，它们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即太多联邦法官“拒绝遵循法律与宪法，以个人偏见和观点扭曲判决”。因此，不能排除这些毫无根据地援引《巴黎协定》对环境监管改革的挑战，即便不是最终，也可能首先在某些联邦法院胜诉。即使假定他们败诉（他们理当如此），这些挑战也会耗费稀缺的公共资源，拖延实施合理的环境监管政策，同时无端造成公众混淆行政行为的国际“合法性”。

美国应退出《巴黎协定》。美国继续保留《巴黎协定》成员国身份，可能被用作公共政策的“附加因子”，挑战基于联邦政府法律的环境监管改革，而非基于任何协定。此类“附加因子”理论尽管缺乏法律依据，但却会令行政行为进一步复杂化。即使抛开短期立法风险，美国继续保留《巴黎协定》成员国身份，未来也会被其他总统以正当理由援引，作为监管及新法实施，而这将削弱化石燃料工业，并损害美国经济，所有这些因素都对特朗普决定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形成强有力支持。

四、退出《巴黎协定》的法治考量

最后美国加入《巴黎协定》引发了担忧。这是一个根植于尊重法治的担忧。然而，正如传统基金会《宪法指南》所述，总统未经国会参与，单方面签订行政协定的权利“仍是严重问题”。此外，根据以往经验，《巴黎协定》具有所有协定的特征，比如目标和时间表。因

此，应作为条约，提交参院批准。

拟议条约应经参院三分之二多数同意。这是《美国宪法》条约条款的要求。奥巴马总统绕过参院，无视这一要求，表现了对国会作用和条约制定的民主程序的藐视。

美国总统无疑有权终止加入《巴黎协定》。尽快实施这项权利有利于美国经济，同时也促进了法律与宪政合理原则。

（摘自 Why Trump Can and Should Pull Out of Paris Climate Change Agreement, *The Daily Signal*, 2017 年 5 月 6 日，由余菁编译）

《利益集团与财政政策》

编者按：2017 年 3 月中旬，联邦政府行政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发布了 2018 年预算蓝图。OMB 主任马尔维尼（Mick Mulvaney）高度夸耀这份“重新使美国变得伟大”的“预算蓝图”，他认为这份联邦预算蓝图，第一满足了特朗普增加军费的要求，其次在保证不增加联邦负债的情况下，满足特朗普总统施政其他优先要求，两大前提一目了然，而且这份预算蓝图中体现了特朗普对联邦财政责任承诺的历史性。本期编发 2018 年预算蓝图强化行政管理与减少监管的预算观点。

OMB 预算蓝图强化行政管理

政府应当更美好。联邦政府有能力、也应当更高效地、更有效果地、安全地运转。数十年来，共和、民主两党领袖共同探讨了推动联邦政府更加美好的可能性。现在（特朗普）总统先生为让政府更好服务美国人民，采取了大胆举措。

总统先生采取了以下两项重要行动。在 2017 年 1 月 23 日，作为他当选后的首项行动，特朗普总统颁布了第一项备忘录，即推进政府“冻结雇员”与长期削减政府职工规模计划。此外在 2017 年 3 月 13 日，总统先生签署了第 13781 号行政法令。该法令确立“全面改组政府部门计划”，确实推进了政府部门和机关的改组工作。以上两项行动相辅相成，计划还应反映了总统的作为。政府部门在执行重大改组之前，立法程序不可或缺，但白宫最适合审查并向国会改革提出改革建议。在今后大约一年，国会将收到来自总统及行政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主任提出的包括改组方案的综合计划。白宫将与国会委员会密切合作，对政府机关加以监管，以确保必要的改革扎扎实实得到实施。

美国联邦政府还发布了总统管理议程。与此同时，此议程旨在实现对其核心管理有效性的重大改进。总统的管理议程还将改善政府有效性、提高效率、加强网络安全和问责机制等领域的关键目标。联邦政府将采取行动，确保我们在 2020 年底达成以下四大目标：

第一，联邦机关将更有效地提供关键性服务。联邦政府正在规范项目，并将采取循证方法，利用真实、有力的数据改进方案、优化服务，查明表现不佳的机关与项目。我们会让项目管理者改进表现，为美国人民和企业提供优质及时的服务。我们将使用已有工具，并且依需求创造新的工具，以计算出合适的劳动力储备规模。

第二，联邦机关将纳税人税款更多地投入到完成国家使命的活动。税款不应用在高成本、非生产性遵从活动中。以往的管理改进举措产生了数以百计的指导文件，旨在更多通过增加对信息技术、人力资本、采购、财务管理和不动产的要求，改进政府行政管理。此外，这些政府范围的政策常常束缚着机构的“手”，使管理者无法根据常识做出决定。因此，利益却往往没有随着成本增加而相应提高。联邦政府会把那些低价值项目回收，并纳入联邦管理者管理范畴，对其问责，寻找降低运行成本的途径。此外，OMB 还在努力审查对联邦机关

的要求，以确定那些需降低过时的、低价值要求的领域。

第三，在联邦机关支持项目的结果中更有效率和效果。对企业和公民提供更高绩效的项目和服务，取决于支持服务的有效且高效的政府使命。然而，尽管联邦政府在改进关键管理过程中付诸多年的努力，然而联邦管理人员却仍旧面临重重困惑，例如，无法掌握招聘方法，持续引进顶尖人才，收购流程过于繁琐，信息技术过时。联邦政府将利用已有数据，开发目标方案，解决联邦管理人员面临的难题，并通过直接分享、采纳来自于私营和公共部门的领导经验，进一步实施有关方案。即将推出解决方案的领域包括：联邦机关如何采购公共产品与服务、雇佣人才、利用自有不动产、支付账单并优化技术。

第四，对机关进行问责推动改革。所有联邦机关将报告关于改革的重要指标，展示明显的进步。在实施改革方面，OMB 还将定期审查各个机关取得的进步，确保持续改进。

通过以上议程，我们将大刀阔斧，改进联邦政府的有效性、提高效率、强化网络安全、实施责任制，再次让政府高效能运作起来。

OMB 删繁就简放松监管

联邦政府机关的行为与美国人民背道而驰。美国人民理应拥有一个为自己服务、而非反对人民的监管体系。这个监管体系既要有好的效果，又要有搞得效率。然而，联邦机关每年都发布数以千计的新法规，而这些法规却使美国消费者和企业背上了沉重负担。这些负担很像那些税款，既不必要、又抑制增长和就业。许多规章虽然充满善意，但却并未达到预期目标、没有利用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且常常产生不利、意料之外的后果。还有更多多年前制定的法规，尽管当时有效，现在却可能不再是有效或必要的了。

总统致力于解决上述问题。为此，总统已采取了三个重要步骤，废除了那些既不必要、又无用的规章。这三个步骤是：

第一，冻结监管。在 2017 年 1 月 20 日，总统办公厅主任向所有机关发出备忘录，回收已发送给美国联邦登记办公室、但尚未公布的规章；除非由政府政务官员批准，今后不得发布任何新规章；将任何待办条例的生效日期推迟 60 天，留待政府审查、重新考虑这些规章的时效性。联邦机关通过回收、推迟行为，对所有可能不再发布的规章做出了回应。

第二，控制成本，削减非必要法规。在 2017 年 1 月 30 日，总统签署了《减少管理和控制监管成本》的第 13771 号行政法令。这项行政法令代表了国家监管政策的根本性变化。法令要求联邦机构每发布一条新法规，至少需要取消两条现行法规。此法令还要求各机关，确保在 2017 年所有发布的新条例，总成本增量不超过 0 美元。自 2018 年以后，此法令建立了一个严格的流程并加以制度化，为每个联邦机关实施监管，施加成本上限。这项行政法令所构筑的重大结构性改革，为联邦机关执行总统大胆的监管改革议程，提供了必要框架。

第三，执行监管改革议程。总统作为成功的商人，他深知，成功的必要条件是问责制。这一项基本原则是 2017 年 2 月 24 日总统签署《执行监管改革议程》的第 13777 号行政令的原因。该法令要求，在每个机关内，分别设立一名改革监管官、一个管理改革工作队，执行总统的监管改革优先事项。新团队将努力找出抑制就业或不利于创造就业机会的规章制度、找出过时的、不必要的或无效的规章制度，或那些弊大于利的规章制度。他们还将为确保这些机构遵循总统的指示（联邦机构每发布一条新法规，至少需要取消两条现行法规）切实负责；确保调控不增加新成本，并努力废除、替换或修改现有法规。

此法令以广泛认可与两党共识为基础。许多现行法规很可能是无效的、不再必要的，明确无误地以第 13563 号行政法令提出的回溯审查为基础的。然而，区别在于问责制。这些团队将是联邦机构以聪明、高效的方式，确定和削减规章的关键手段。总统最近向美国人民

宣告：“空谈的时代已经过去”。对总统而言，监管改革意味着经营。总统前所未有地、在真正意义上建立了重大结构化机制，将代表那些勤劳、却被遗忘的美国人民，确保重大的监管改革最终得以实现。OMB 信息与监管事务局已开始大力支持上述重大改革，并确保改革措施在未来几个月、几年内，完全成功地化为现实。

（摘自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Management—Making Government Work Again, in *America First: A Budget Blueprint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https://www.whitehouse.gov/omb>, 2017 年 3 月 18 日，第 7-10 页，由马樱梦编译）

HASC 反对 2017 财年接续决议案

“我认为众院不会通过全年财政接续决议案”。这是国会众院武装部队委员会（HASC）主席索恩贝里（Mac Thornberry）的观点。全年财政接续决议案并不常见，但近几年来国会总是不能及时通过拨款法案，而拨款法案才是国会最基本、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所以在过去的八年，国会每年都要通过一个或者两三个接续决议案，以保证行政部门施政有充足资金。

国防界别的议员对这种财政拨款模式尤其不满。因为任何财政接续决议案通常都会意味着不能增加新资金，并且财政支出还需保持在上个财年水平。“我相信，本次听证会在座的 HASC 委员，都不会支持全年接续决议案”。

这并无法解决废除财政扣押问题。当然，特朗普总统和其他资深共和党人都支持废除财政扣押政策（Sequestration）。HASC 主席 Thornberry 担心特朗普当局需要调整五角大楼的人事安排，参院是否通过任命还没确定，副部长仍由奥巴马时期的国防部副部长担任代理，另外还五个国防副部长的人选也没有着落，更不用说承担落实政策的其他五角大楼助理副部长们了。

Thornberry 与特朗普当局对俄罗斯存在观点分歧。Thornberry 指出，俄罗斯最新部署的巡航导弹违反了中导条约，俄罗斯间谍船在美国东海岸进进出出以及其他行为需要引起注意。“多年来俄罗斯一直在挑衅，我可不认为这是 1 月 20 日后突然出现的问题”。Thornberry 期望白宫向国会呈送一份国防拨款补充法案，“以此主动表明，我们愿站稳脚跟，而并不完全是用来对付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挑衅”。

（摘自 Colin Clark, Thornberry Says HASC Would Oppose Year-Long CR, <http://breakingdefense.com/>, 2017 年 3 月 18 日，由高丹编译）

2018 年国防预算将超 7000 亿

目前国会参众两院正在弥合 2018 财年国防支出与对方的数字差异。通过两院国防支出法案各个支出项目的一一对照，众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提出的预算总支出为 7040 亿美元，参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提出的支出数额为 7080 亿美元，差距仅为 0.6%，超出了茶党预算鹰派和特朗普总统行政当局提出的 6680 亿美元。

两个委员会的国防采办支出存在显著差异但却无伤大雅。参院想采购更多的 F35 战机和 F/A18 战机，因为参院主席麦凯恩是前战斗机飞行员，而众院则想买更多艘濒海战斗舰，而恰恰麦凯恩却不喜海战舰，这又迎合了许许多多老派的海军军官。可偏偏他们在采购多少架 P-8A 波塞冬海军间谍飞机（6 架）、采购多少架舰到岸登陆船式（(SSC) 气垫飞行器（5 艘）清单上高度吻合。

今年争夺国防预算的战斗将不在参众两院打响。这场战斗将在国会与其他任何一方之

间展开，也就是说谁为国防支出买单，这将从废除《预算控制法》下手。

（摘自 Sydney J. Freedberg Jr., House, Senate Only 0.6% Apart On Defense Budget: \$704B vs. \$708B, <http://breakingdefense.com/2017/07/house-senate-only-0-6-apart-on-defense-budget-704b-vs-708b/>, 2017 年 7 月 3 日，由熊璞编译）

保守派压特朗普大砍环保预算

特朗普减少监管从环保下手了。不久前，白宫发出混合信号，要么通过削减财政开支、要么通过推动经济增长，为特朗普总统寻求提高国防开支提供资金。但是，无论采取哪种方式，这都是大幅减少过度监管预算的好时机，首当其冲的是美国环境保护局。现在预算提要已发送到各个联邦机构征求意见，与此同时，环保团体却对传闻中的削减环境保护局 80 亿美元预算计划怒气冲冲。

然而特朗普还是大方的。相比之下，众议员约翰逊（Sam Johnson）提出在 10 年内对铺张浪费的环境保护局削减 75 亿美元预算的计划，这当然需要。众议员盖俄兹（Matt Gaetz）则甚而提出完全撤销环境保护局议案。

彻底改革环保局并没有夸大国民要求。全国主要环境法规早已过时，并不反映现实需求。环保局官员常常忽视监管成本、夸大利益、跨越法律和宪法界限。此外，尽管温室气体对环境影响的不确定性相当大，大量纳税人钱财还是被浪费在避免全球变暖的无用方案上。奥巴马当局时期，环保局财政表现非常好，年度预算仅为联邦总支出的 0.22%。但是，还有很多支出与该机构有关，却没有纳入预算。不必要的环境监管法规造成创新和经济增长无法估量的成本，造成私有财产权和自由的损失。尽管环境质量大大提高，但联邦法规数量和成本几十年来持续增加。特朗普总统在大选中承诺“大规模削减”环境保护局预算。我们希望如此。

国会应撤销与气候有关的九个项目。此举将节省近 36 亿美元，这些措施包括：（1）管控车辆排放的温室气体（还包括非道路设备、机车、飞机和运输工具）。（2）管控电厂、工厂锅炉和其他固定排放的二氧化碳排放。（3）温室气体报告计划。（4）全球甲烷倡议。（5）气候恢复基金。（6）气候弹性评价工具。（7）绿色基础设施计划。（8）有利气候的水利倡议。（9）研究和发发展办公室的气候研究基金。

减少环保局计划与职责。此举将降低间接费用，国会在 2018 财年将环境保护局约 4.89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和操作经费削减 10%，将节省 4900 万美元。还应将环保局 2018 财年 1.74 亿美元的民事执行计划经费至少削减 30%，该计划对严重环境违法的行政与司法案件提起诉讼、加以解决，然而，环保局存在不必要的和过度的法律行动。因此，减少一点经费、施加一点纪律因素，可使该机构对监管与执法活动挑战法律更加谨慎。

将环境保护活动移交州与私人业主或完全撤销。此举将节省数以百万计的美元资金，其中包括：（1）国家河口/海岸航道计划。河口与海岸地区的恢复保护最好由州、私营业主管理，而不是联邦政府（节省 2700 万美元）。（2）综合环境战略计划。促进“可持续发展”、“理性增长”和类似社会工程，不属于联邦政府应有职能（节省 1100 万美元）。（3）污染防治计划。该计划并无助于修复现有污染，更应交由私营部门（节省 1300 万美元）。（4）地表水保护方案。应该由各州管理边界内的水体（湖泊、河流、溪流）。由各州自行管理将增加系统的稳定性、透明度和效率，而不是由联邦政府管理（节省 2 亿美元）。（5）联邦车辆于燃料标准及认证计划。按照消费者对燃料效率的需求，不必要由政府规定排放标准。可再生燃料标准造福了小部分特殊利益集团，增加了食品和能源价格，这毫无必要（节省 9300 万美元）。（6）环保局《资源保护与回收法》废物最少化与回收计划。这些计划无助于清理危险

废物，却专注于促进回收和其他不必要的活动（节省 900 万美元）。(7) 对其他数十个项目和机构活动的改革时机也已成熟。

环保主义者保护现状可以理解。但是，特朗普承诺对联邦政府、尤其是对环保局这个华盛顿最富有、最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之一，进行重大改革。现在是时候完成它了。

（摘自 Diane Katz, How Trump Can Clean Up the EPA's Bud, *The Daily Signal*, 2017 年 3 月 1 日，由李维佳编译）

《利益集团与税收征管》

Kautter 任财政部税收政策助理部长

特朗普总统任命大卫·J·考特 (David J. Kautter) 为财政部税收政策助理部长。白宫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宣布了这项任命，Kautter 此前是税务和咨询服务公司 RSM 美国律师事务所的主管合伙人。白宫公布说，Kautter 曾担任美国大学 Kogod 商学院 Kogod 税务中心的独立税务研究所总经理，他还在安永律师事务所服务 30 年，其中有 13 年在那里担任国际税务主管。从现在起，Kautter 将接替马祖尔 (Mark Mazur) 的职务，Mazur 是奥巴马当局任命的财政部税收政策助理部长。而韦斯特 (Thomas West) 目前在代理税务政策助理部长职位任职。

Kautter 据说与特朗普当局对税收政策的看法一致。2014 年，Kautter 在众院中小企业委员会听证时公开宣称，如果“企业税改革”按照“营业税改革”进行，将会对国家更有利。当时，Kautter 提出，国会应该考虑对所有业务收入采取单一税率表，而不管企业采用何种法律形式。特朗普的税收计划针对所有企业提出了 15% 的税率。Kautter 称：“非法人企业（往往是中小企业）要按照较高的个人税率纳税，而对法人企业所得征收的却是更低的企业税税率，考虑到小企业对我国经济的重要性，这没有反映常识”。

安永欢迎这项任命。2017 年 5 月 11 日，财政部前税收政策助理部长，全国税收副主任、安永美国税务中心副主任蒙达卡 (Michael Mundaca) 发表声明称：“Dave Kautter 赋予了税收政策助理部长岗位大量重要属性，他具备在税收改革进程中与各种利益相关者进行成功的人际交流的技巧，包括与财政部其他人士、白宫、众院共和党和民主党、公众展开合作”。

（摘自 Jessica Jeane, Trump Nominates Kautter For Top Treasury Tax Policy Post, [http://intelliconnect.cch.com/scion/secure/ctx_4920031/index.jsp?cpid=WKUS-TAA-IC#page\[4\]](http://intelliconnect.cch.com/scion/secure/ctx_4920031/index.jsp?cpid=WKUS-TAA-IC#page[4]), 2017 年 5 月 12 日，由李维佳编译）

众院筹款委员会函询 IRS

众院筹款委员会两党领导联合向 IRS 局长约翰·科斯基宁 (John Koskinen) 发出信件。该信件意在获取 IRS 对特定纳税人安全风险信息的获取程序。筹款委员会主席凯文·布拉迪 (Kevin Brady) 和资深议员理查德·尼尔 (Richard Neal, Ranking Member)，以及监督小组委员会主席弗恩·布坎南 (Vern Buchanan)、众议员约翰·刘易斯 (John Lewis) 共同参与了这封在 2017 年 4 月 28 日信件。

议员们关注给 Koskinen 的信函。最近，IRS 暂时关闭了数据检索工具 DRT (即 Data Retrieval Tool)，DRT 能够帮助学生以及家长，使他们接触和传递有关联邦大学生援助的免费应用程序 FAFSA (Free Application of Federal Student Aid) 所需纳税申报信息。IRS 暂时删除工具是因为该系统存在网络安全攻击风险。据 IRS 报道，直到 DRT 安全升级之前，该工具将一直处于离线状态。议员们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危险分子对联邦系统构成持续网

络威胁，但 IRS 必须继续注重纳税人信息保护与纳税人与 IRS 交流权利之间的平衡，特别是在网络领域。我们仍然深切关注，IRS 并没有尽其所能，正确评估并防止对纳税人信息未经授权访问，特别是通过 IRS 的在线工具和应用程序进行”。

（摘自 Ways and Means leaders ask Koskinen about DRT, *EY Tax Alerts*, 2017 年 5 月 8 日，由李维佳编译）

编者按：2017年4月26日特朗普团队终于在执政满百日之际，公布了简要的税制改革计划，针对朝野的质疑，由白宫与财政部核心官员出面加以释疑，其中所谓“互惠税”、行政当局与国会的合作、新的避税产生以及附带权益问题颇受重视，本期继续就特朗普税改方案摘发数篇有关报道于后。

企业税 15%与辖地税制是特朗普税改核心

特朗普当局已发布了15%的企业税与进行辖地税制改革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将征收15%的企业税、并对美国公司的海外收入征收一次性税收。财政部长努钦（Steven Mnuchin）表示，上述针对海外公司盈利的“遣返税”税率连同其细节将与国会进行协商。联邦政府行政当局首次呼吁，应进行辖地税制改革，对海外所得进行征税。特朗普在2015年总统大选期间，曾呼吁消除改革障碍，改革美国的全球征税制度，但在前一段时间，他却未曾表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2017年4月26日白宫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长Mnuchin与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科恩（Gary Cohn）都没有提到众院的边界调整税方案。

新发布的税改大纲有所修改。个人所得税税率设定为10%、25%和35%三档。之前国会共和党的税改方案提出，税率设为12%、25%和33%三档。特朗普的此次税改提案已与国会众院的税收改革蓝图相同。行政当局计划要求取消房贷利息和慈善捐款以外个人纳税扣除政策，并要求废除替代性最低税（AMT）政策，取消遗产税政策。Mnuchin部长说：“在个税改革方面，我们将取消房贷利息和慈善捐款外，所有个人所得税减项额。我们认为，这就是全面改革”。根据其计划要求，还将个人标准扣除额增加一倍。最高资本利得税将保持在20%，同时废除3.8%的奥巴马医保税。行政当局在发表的简报中称：“特朗普当局在整个5月都要举办听证会，听取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行政当局还将继续与众参两院合作，商定税改计划细节，争取制定出一份大规模减税、创造就业机会、使美国更具竞争力、两院都满意的税改计划”。

共和党议员联合声援特朗普税改。在行政当局发布通告以后，众院议长、威斯康星州共和党议员瑞安（Paul Ryan）、参院多数党领袖、肯塔基州共和党议员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众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得克萨斯州共和党议员布拉迪（Kevin Brady）与参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犹他州共和党议员哈奇（Orrin Hatch）发表联合声明称：“今天特朗普当局提出的税改原则将作为国会和行政当局共同改革美国税制的重要指针。我们将确保中产阶级家庭和就业创造者更适合现今21世纪的经济体。低税率能使个人与家庭保留自己来之不易的金钱，并赋予他们投资未来的能力。降低美国企业税率，无论规模大小都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使美国成为一个更诱人的经商之地。我们着眼于公平与简化，相信我们能够以促进经济的方式，重建我国税法，更好地促进储蓄和投资，为我国的就业创造者提供竞争优势，并推动美国更加繁荣”。

民主党议员反对这项税改计划。参院财政委员会资深议员、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威登（Ron Wyden）发表声明称：“这是一个毫无原则的税收计划。这个计划只对美国百分之一的人减轻赋税；它使总统的承诺前后矛盾；它给美国带来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它给劳动人民只带来了‘面包屑’。这项税改并未像承诺的那样，提供一个真正的税改计划，联邦政府正在向幸运的少数人提供‘蛋糕’”。

行政当局与国会就税改基本达成共识。财政部长Mnuchin重申，行政当局喜欢国会的属地税制方案，但却不喜欢其他政策。他说，行政当局告诉国会议员，税制改革计划不会以现有的形式退出。但他们希望，在税改计划上与国会合作。国会众议院议长Ryan声称，他承认边境调节税方案必须修改以避免冲突。此外，白宫与国会已就80%的税收改革计划达成共识。

（摘自 Trump tax plan calls for 15% business rate, territorial tax system, *EY Tax Alerts*, 2017 年 4 月 28 日，由马樱梦编译）

特朗普税改计划自圆其说

特朗普总统说行政当局的税改计划只是一个“起点”。他近期还说，愿意与国会进行谈判，放弃一些条款。与此同时，行政当局的官员强调，不公布更详细的计划，是因为希望与众院和参院展开合作，推动税改法案通过国会。总统上任满一百天可忙坏了新闻记者，总统的经济团队一直以来，也在澄清行政当局于2017年4月26日税改计划的意图和预望。特朗普总统还说，他将考虑提高联邦汽油消费税，为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融资。然而，当时的白宫新闻秘书斯派塞（Sean Spicer）后来澄清说，总统并没有表示支持或认可提高汽油税，只是简单地提到某行业集团告知他的情况。就此问题，财政部长努钦（Steven Mnuchin）在米尔肯研究所举办的某会议上表示，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应不会与税改计划有任何交叉。

特朗普谋求通过经济增长和“互惠税”弥补税改导致的赤字。这是特朗普总统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4月30日《国家面对面》节目中说的。他举例说，如果我国生产的产品出口给其他国家，他们向我们征收100%的税收。而他们制造同样的产品出口给我们，我们却什么税也不收，这很明智吗？不明智。“我们要对这些国家也征收互惠税，或采取其他类似行动。但我认为，在贸易中这更重要。我国还将修正所有的贸易条款。我国将再次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

财政部认为税改计划做的并不复杂。财政部长Mnuchin与全国经济委员会主任科恩(Gary Cohn)都强调，为了便于就税改细节与国会谈判，税改计划做的并不复杂。两人均未给出公布更详细计划的时间预期。Mnuchin对CNBC说，“我们没有提出更多细节，原因是我们希望与众参两院合作，并达成联合协议。所以当我们公布本计划时，是可以在国会通过，并且是总统能签署的文本”。Mnuchin还说会尽快公布更多细节，为此行政当局有领导层周会、工作人员层级会议更频繁。我们对想努力完成的目标有着相似看法。

全国经济委员会认为首先要让税改法案生效。Cohn对CBS《今天上午》节目说，我们想在起草最终议案之前，征集大量意见。当我们递交最终议案时，希望得到众参两院采纳。我们明白这有多困难。我们说，它是如何被设计成困难的，对此我们都理解。让它生效的办法就是，在起草税法之前就与国会进行合作，而这正是我们要做的。

Cohn还说税改法案有利于中产及下层阶级。有人质疑特朗普税改计划主要有利于高收入个人，Cohn说，人们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如果看看我们所做的，把个人免税额提高了一倍，就清楚了。Cohn承认，税改计划要取消遗产税，但同时也将取消有利于富人的纳税扣除政策。

众院筹款委员会表达了合作愿望。据彭博社报道，众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布拉迪（Kevin Brady）曾表示，在行政当局发布更详细税改方案之前，不打算将提案提交筹款委员会审议，因为“我们在合作制定统一税改计划”。据报道，在2017年4月30日~5月1日筹款委员会共和党人举办的税改研讨会上，Kevin Brady称，筹款委员会将于5月份召开税改听证会，但他们希望白宫首先将行政当局的方案融入众院税改蓝图。Kevin Brady会后发表声明提到，我们讨论了竞争力问题，美国实现跨越，重回全世界上最高生产力之一，工作岗位与投资项目都更多。

昨晚，我们与Cohn主任就总统关于促进税收改革的承诺进行了深入讨论。我们还详细地讨论了中产阶级减税政策，以及如何为美国劳工简化税法。

财政部将解决避税难题。财政部长Mnuchin在接受CNBC采访时，对于高收入个人可能因适用税收穿透实体，享受15%所得税率而受益时回答，规则是明确的，工薪所得将按工资收入项目进行征税，最高边际税率为35%。还要为中小企业创造就业机会，让中小企业享受15%的优惠税率。不想看到那些应按35%税率纳税的人，通过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规避税收。政府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应当阻止人们利用税率差异避税，“在政策出台之前，我们非常确定，不会导致避税问题”。

税改方案不涉及附带权益问题。在2017年4月30日ABC播出的《本周》节目中，白宫办公厅主任雷恩斯·普瑞巴斯（Reince Priebus）宣称，“我们已经注意到附带权益问题，总统想消除附带权益。因此，我可以向你保证，气球膨胀不可能太久”。

（摘自 Trump team seeks to clarify tax plan expectations, *EY Tax Alerts*, 2017年5月4日，由李铃、沈淼编译）

特朗普税改纲要引两党对立

民主共和两党议员一直在权衡对税改本身与特朗普税改纲要的立场。特朗普总统于2017年4月26日发布那份备受期待的行政当局税收改革提案后，众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Nancy Pelosi）翌日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她称特朗普税改方案所勾勒出的，是一个“亿万富翁的愿望清单”。她说：“美国负担不起又一个共和党税收计划。那是一个踏在中产阶级背上、对最富有人群进行价值数十亿美元减税优惠的计划”。尽管Pelosi批评了特朗普的提议，然而她却表示，民主党人准备团结一致，对税法进行简化。“两党合作进行税改存有空间”。参议员卡丁（Benjamin L. Cardin）也发推特，批评特朗普总统的税改提议。他说：“这不是什么计划，这只是几个要点。这也说明，总统是如何把有钱的企业摆在中产阶级家庭之前的”。而Cardin还谈到，两党合作进行税改非常必要。他说：“现在已经有了以两党联合方式进行税改的严肃提议，税改应当对中等收入家庭更公平、并提高收入、减少赤字”。

许多共和党人也为特朗普税改纲要的努力和原则鼓掌。即使这批共和党人不赞同提案本身及其具体规定，众院议长瑞安（Paul Ryan）、众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布拉迪（Kevin Brady）、参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参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哈奇（Orrin G. Hatch）还共同发布声明称，特朗普税改纲要中蕴含的原则，将成为国会议员和特朗普当局共同进行税改的“关键路标”。参议员格拉斯利（Charles E. Grassley）也在税改大纲具体内容并不明朗时，就大加称赞说，特朗普“开启了税改讨论”。Grassley在声明中说：“税改是一项重大事业，开启了总统与国会以及美国人民的大讨论。特朗普总统通过提纲来展开对话值得信任。特朗普正确地将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划定为税改的重中之重。随着行政当局与国会共同就政策和立法草案达成协议，有关税改的大讨论无疑将得到继续”。

（摘自 Jessica Jeane, Lawmakers React To Trump's Tax Reform Outline, *Federal Tax Day*, 2017年4月28日，由李维佳编译）

筹款委员会谋求一统税改

国会众院筹款委员会共和党议员结束了为期两天的政策会议。此次政策会议主要讨论提高美国企业竞争力及调整中产阶级减税政策。会议主席、德克萨斯州众议员布拉迪（Kevin Brady）说，此次会议目的是提出众参两院及特朗普当局都能支持的单一税改方案，促进美国经济持续发展。

国会众院与白宫达成部分共识。Brady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的各种想法和解决方案取得了进展，并会在即将与白宫及参院讨论会上提出”。与会成员也与白宫全国经济委员会主任科恩（Gary Cohn）共同讨论了特朗普总统税改重点，并就相关提议取得进一步共识。Brady还证实了筹款委员会发言人之前关于税改听证会即将举行的说法。Brady预测，听证会将在五月举行。筹款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根据筹款委员会章程，任何听证会需提前一周告知。

共和、民主两党的合作受到期待。参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犹他州参议员哈奇（Orrin G. Hatch）力劝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在税改上进行合作，以共同展现两党的努力。“我已经多次谈到，税改不应是某个党派的分内事儿”，“我国当前的税收制度对共和、民主两党选民来说，都带来了较大负担”，Hatch说。他还补充道，先不谈特朗普总统的税收方案细节，他带头进行税改，就是在向所有税改提倡者表达欢迎之心，不论他们属于哪个党派”。

部分民主党议员仍持保留意见。一些民主党人仍继续批评共和党的税改蓝图及特朗普总统4月26日税改大纲。一些民主党议员主要担忧特朗普税改大纲并未提到附带权益。“特朗普的税收方案只偏向于富人阶级”，前筹款委员会资深委员列文（Sander Levin）在推特中说，“他保证将摆脱附带权益漏洞，但在大纲中却并未提到”。Levin多次提到解决附带权益漏洞的附带权益公平议案，并声明说，“特朗普总统需要解释清楚，不论税改结果如何，他将坚持对附带权益政策的承诺”。Levin表示，据税收联合委员会估测，一旦解决了附带权益政策漏洞，联邦政府将增加156亿美元财政收入。

（摘自 Tax-Writing Chairmen Seek Unified Tax Reform Plan, *Federal Tax Day*, 2017年5月3日，由马樱梦编译）

共和党起草税改蓝图

共和党议员透过为期两天的政策研讨会关注税制改革。筹款委员会主席布拉迪（Kevin Brady）主席表示，两天的讨论主要焦点是如何推进税改，“以带来最长久的最大增长”。他补充说，税法起草班子一直在考虑国际竞争力和削减“中产阶级税”的细节，考虑如何简化我国残破的税法。筹款委员会是众院主要税法起草委员会。

（摘自 Republic Tax Writers Developing Tax Reform Blueprint, *Global Daily Tax News*, 2017年5月4日，由李铃、马樱梦编译）

国会举行税改听证

2017年5月国会税法起草委员会连续举行推进税收改革听证会。参院财政委员则在5月25日与财政部长努钦（Steve Mnuchin）会晤。听证会内容侧重根据财政部对行政当局预算要求和当前政策进行税法改革。Mnuchin于5月24日来到众院筹款委员会听证会，讨论税改问题。参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犹他州共和党议员哈奇（Orrin Hatch）说：“Mnuchin部长来到财政委员会讨论总统2018年预算案，还将进一步研究税改政策，以促进就业、提高工资，并为所有美国人提供更多机会”。

参院财政委员会近期也听取了共和、民主两党的税改建议与税制改革必要性意见。此外，全国经济委员会主任科恩（Gary Cohn）与财政部长Mnuchin会晤，讨论了税改政策的可行选项。筹款委员会召开听证会的目的是考察税收优惠政策的好处。

（摘自 US Lawmakers Continue Tax Reform Talks, *Global Daily Tax News*, 2017年5月23日，由马樱梦编译）

众院听证企业税改

众院筹款委员会举办了一系列税改听证。在2017年5月18日的听证会上，全体筹款委员会一致听取了商界代表与税收联合委员会的意见。AT&T公司首席财务官斯蒂文（John Stephen）强调说，税制改革不应是临时性的，改革的“持久性非常重要。[持久的税改]能保证我们进行一致的、重要的资本投资”。

共和党改革计划必须保证税收中性。此举是为了满足总数为五分之三（多数）的国会议员要求（政治上难以实现的），任何增加联邦赤字的税改计划将无法得到国会通过。利益集团税收基金会指出，正如以前预测的那样，此次改革无法实现税收中性，而且，税收基金会建议，共和党与特朗普当局提出的改革蓝图需要制定财政收入抵消措施。

民主党议员发表了不同意见。据彭博社报道，马萨诸塞州民主党资深议员尼尔（Richard Neal）认同进行税改的必要性，但他也表示，“民主党反对任何帮助富人致富、反对任何不为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做事儿的税改计划”。艾默生电气首席执行官、全国制造商协会（NAM）董事会主席法尔（David Farr）说：“低税率将使制造业更具竞争力、鼓励更多企业来美境内投资、增加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边境税制度]将增加美国国内就业、促进出口、提高美国基础供应商实力，并使美国的境外投资回流。低税率指出还会降低税后资本成本，推动投资增长，促进经济增长，带来就业增加”。

商界代表对税改持保留意见。标准普尔全球首席执行官彼特森（Douglas Peterson）说：“改革延误造成的成本也是投资成本的一部分。如果延误的结果是我们没有看到更低的税率，也没有实施边境税制度，那么我们将会看到，有更多公司寻找转移投资机会，它们的海外现金不会流回国内。在我们这个行业，就有个公司在海外投入了33亿美金。我们[美国]没有任何可能促使现金回流”。众院筹款委员会于5月23日还将举行提高美国竞争力和预防美国工作机会流失海外的另一个听证会。

（摘自 Ways And Means Hear From Businesses On Tax Reform, *Global Daily Tax News*, 2017 年 5 月 22 日，由马樱梦编译）

税收基金会鼓吹全部费用化政策

资本投资的全部费用化可能是国会议员激励经济增长所能做的最重要税收改革。通过从营业税税法中去掉对投资的几乎所有障碍，全部费用化将使美国经济的长期规模增长 4.2%，使工资提高 3.6%，创造 80.8 万个全职工作岗位。事实上，我们发现，企业全部费用化对美国经济的冲击是单一企业所得税税率下调的两倍。

然而这项政策最大的挑战是其“天价”。对全费用政策支持者而言，全部费用化将造成联邦税收损失。例如，据税收基金会在 2016 年 6 月估计，全部费用化将在 10 年内静态减少 2.2 万亿美元联邦税收收入。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自然足以会让国会议员们暂停。但这一说法可能夸大了政策的真实成本。如下 5 点是全部费用化最终成本可能远低于 2.2 万亿美元的几个原因：

第一，全部费用化提出的背景是降低美国企业边际税率的税改计划。重要的是，企业的边际税率越低，全部费用化所降低的联邦税收收入就越低。例如，在 10 年内，20%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下的全部费用化的成本比在 3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下低 7000 亿美元。第二，全部费用化在 10 年内的税收收入损失大多来自一次性过渡费。这些过渡成本在实施该政策的第二个 10 年内几近消失。因此，全部费用化的长期成本比短期成本要小得多。其中的一个例子是，公司全部费用化在政策实施的第一年，会使静态联邦税收收入减少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5%，但在第十年仅占 GDP 的 0.4%。第三，从长期来看，全部费用化成本中的政策成本比想象中的少得多。事实上，从长期来看，以静态为基础，对公司实施全部费用化，将比把公司所得税税率降低 25% 造成的成本更低。第四，税收联合委员会所估算的全部费用化静态成本可能比税收基金会所估算的政策成本更低。考虑到税收联合委员会是国会税收政策的官方统计机构，这一点很重要。最后，全部费用化将有可能促进美国经济大幅增长。额外的增长将增加个人所得税和工薪税税基，从而部分抵消收入损失。

一、什么是全部费用化？

根据联邦现行税法，当企业进行资本投资时，如购买机器、设备、建造建筑物时，不允许立即扣除投资的全部成本。相反，企业却需要通过“折旧法进行扣除”，通过很长一段时间，扣除资本支出费用。现行的税收折旧制度不仅相当复杂，而且是企业投资的一大障碍。因为企业认为，未来进行扣减和现在进行扣减不一样，如果要求企业在一段时间后完成扣除投资成本，就意味着企业不太可能首先进行投资。因此，许多议员主张完全实行费用化，这种制度使企业得以在进行购买的那一年，就能够扣除全部成本。全部费用化将从营业税税法中移除对投资的偏差，显著降低资金成本，鼓励企业投资并创造就业机会。

二、全部费用化的成本取决于营业税税率

因为全部费用化政策允许企业扣除更多资本投资份额，它会使企业从整体上进行更多扣除。这将减少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从而减少联邦税收收入。当国会颁布增加企业扣除额政策时，由此产生的联邦税收收入损失，取决于企业的边际税率。例如，按照当前 35% 的公司税率，公司额外扣除 100 美元，将减少联邦税收收入 35 美元。但是，如果公司税率是 20%，那么公司多扣除 100 美元，只会使联邦税收收入减少 20 美元。因此，全部费用化的成本完全取决于企业税率。例如，假设公司税率为 20%，实施全部费用化政策，在 10 年内比目前 35% 的公司税率下联邦税收收入将减少约 7000 亿美元。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全部费用化往往是在美国企业法定税率降低的税收计划背景下提出的。例如，众院共和党税收计划提议，全部实施费用化政策，公司税税率为 20%~25%，按照这一税率政策，全部费用化成本将会比现行税法低得多。当税收基金会评估众院共和党的税收计划时，我们不得不依照顺序选择这些条款。因为我们估计，要在降低企业税率成本之前，进行全部费用化财政成本估计，2.2 万亿美元的成本，基本上是对目前企业税率下全部费用化的成本的估计。

但似乎国会议员们已准备好大幅降低美国企业的边际税率，同时又在考虑是否推行全部费用化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思考降低营业税税率的全部费用化财政成本，是更有意义的，因为财政成本将显著降低。

三、全部费用化的长期成本比初始成本低得多

实行全部费用化政策在长期内会降低联邦政府税收收入，同时还将带来数额巨大、一次性的、过渡性税收收入损失。更重要的是，要理顺和分清对联邦税收的这两大影响，从而了解政策的真实财政影响。因为全部费用化将增加资本投资扣除额现值，它将永久性地降低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这会导致联邦税收收入长期下降。然而，从折旧法转型为全部费用化，却会产生额外的过渡成本。全部费用化的政策建议通常允许企业根据以前的折旧法冲销前一年的投资成本。也就是说，如果公司在实行全部费用化的前一年，购入了一个 5 年的资产，在税法未改革之前，它仍然可以对剩余的 4 年进行扣除。

税收基金会税收模型有可能说明所有公司的改革效果。假设国会在 2017 年实施全部费用化政策。通过该模型即可较容易地说明公司在向全部费用化过渡时，作为 GDP 百分比的折旧抵扣数额变化情况。

在改革前的上一年即 2016 年，全面费用化政策尚未通过，根据 MACRS（即折旧制度）

政策，公司折旧抵扣总额约占 GDP 的 9%。这笔扣除是用于 2016 年产生的资本投资，以及以前数年产生、且继续摊销的投资。当全面费用化政策在 2017 年通过后，企业可以对其所有新投资进行全部扣除，同时，根据每个投资计划继续扣除前几年的投资。其中包括上年购入、使用寿命短暂的机器以及使用寿命较长的机器，比如 20 年前建造的大楼。总之，在 2017 年，公司扣除占 GDP 的 16%，其中，10.4%来自新投资，5.6%来自旧投资。随着时间推移，公司每年的扣除金额会减少，因为旧投资被完全折旧了。自 2018~2022 年，公司资本支出扣除额迅速下降，从占 GDP 的 14%下降到 12%以下。到 2036 年，大部分旧投资被全部抵消，扣除额约占 GDP 的 10.5%。

总的来说，企业在全部费用化政策通过的最初几年，扣除额急增，这将大大降低其应纳税所得额。然而，最终在旧法律下产生的投资被完全抵消。在这一点上，根据全部费用政策的扣除，将稳定在 GDP 的 10%左右，只略大于现行法律下的占比。投资扣除的这一突增大大降低了全部费用化政策通过后第一年企业应纳税额和税收收入。然而，全部费用化的成本和扣除额同样随时间下降。

而对于全部费用化政策通过后，自 2017~2036 年，每年的公司所得税收入却表现相反。这是因为，实施全部费用化政策后，公司扣除额先是大幅增加，然后逐渐减少，企业税收收入大幅下降，然后反弹。在全面费用化政策通过后的第一年，公司收入的 GDP 占比下降了 1.5%。但随着时间推移，公司扣除数额下降，全面费用化成本也降低了。到了第十年（即 2026 年），全面费用化的年度成本会略高于 GDP 的 0.4%，低于第一年成本的 31%。到 2036 年，全部费用化政策的年成本是大约是 GDP 的 0.35%，比第一年成本的 1/4 还低。

这种税收收入模式与国会所使用的 10 年预算窗口有着有趣的联系。向全部费用化过渡的成本最昂贵的年份是第 1~5 年。全部费用化在第一个 10 年的成本约为 2.2 万亿美元，这包括联邦政府的税收收入大大减少的最初 5 年，却不包括全部费用化成本较低的第 11~15 年。从某种意义上说，利用预算窗口估计全部费用化成本不理想。

四、全部费用化的长远成本低于 25%的公司税率

全部费用化成本超出了预算窗口，这很有趣。许多看起来比全部费用化成本更低的税务规定，其长远成本实际上更高。例如，将公司全部费用化的成本与 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相比。全部费用化具有 25%的企业税率所没有的巨大前期成本。因此，在第一个 10 年，全部费用化政策的成本将是 25%的公司税率的两倍。然而，全部费用化成本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急剧下降，而 25%的公司税税率成本却与时间推移一致。因此，从长远来看，全部费用化成本小于 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五、税收联合委员会估算的全部费用化成本可能更低

审视税收联合委员会如何分析全部成本化政策，对于确定全部费用化的预算成本以何种方式进入国会税改辩论议程有益。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税收联合委员会对全部费用化的成本进行估计，它会得到比税收委员会所估计的更低的静态成本。

奖励性折旧成本是 2015 年税收联合委员会分析的与全部费用化类似的政策之一。根据税收联合委员会预计，具体来说，将红利折旧永久写入法律，在静态基础上，在 10 年内将减少 2810 亿美元联邦税收收入。另据税收基金会在同年的估算，永久性奖励折旧的 10 年静态成本为 3360 亿美元。此外，根据税收基金会现行模型，永久性红利折旧成本比 2015 年要大得多。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税收联合委员会根据模型，所估计的全部费用化财政成本将比税收基金会模型要低很多。其中的原因还不清楚，我们怀疑，这可能与各自模型如何处理企业净经营损失有关。但不管怎样，这是议员们的重要考量之一，因为税收联合委员会是有关税收立法所产生财政影响的官方仲裁者。

六、全部费用化将促进美国经济增长，部分弥补税收收入损失

全部费用化的成本将低于 2.2 万亿美元。最后一个原因是，这个数字是静态估计，并没有考虑到该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其他影响。在现实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全部费用化将鼓励商业投资、增加产量、扩大税基。这些经济效应将部分抵消全部费用化的静态成本。

在众院共和党税改计划大背景下，我们预计实施全部费用化政策，在静态基础上，将产生 2.2 万亿美元成本，但也会使美国 GDP 增加 5.4%。美国经济的规模扩大，意味着个人收入和工薪税税基扩大，这将有助于部分弥补联邦税收收入的损失，我们估计，全部费用化在 10 年内，动态成本将是 8830 亿美元。

自 2026 年 6 月以来，我们微调了预测模型后现在发现，全部费用化的动态影响更小。然而事实是，全部费用化政策属于促增长最有效的税收改革之一，全部费用化将大大激励企业投资，并在动态基础上将成本大大降低，低于 2.2 万亿美元。

（摘自 Kyle Pomerleau, Scott Greenberg, Full Expensing Costs Less Than You'd Think, <https://taxfoundation.org/full-expensing-costs-less-than-you-d-think>, 2017 年 6 月 13 日，由李维佳编译）

编者按：自十年前的大衰退爆发以来，随着联邦政府财政越来越困难，税制改革成为共和、民主两党的共同口头禅，而所得税体制在实施一个世纪以后，也开始遭遇猛烈抨击，质疑与彻底改革呼声甚嚣尘上，目的地税基现金流流转税思想随之浮上水面。然而，这一税制设想究竟多大程度上能够获得美国多数人认可还真难说。本期就这一话题摘发几篇分析与报道于后。

众院共和党需调整 DBCFT 计划

众院共和党人希望以“目的地税基现金流流转税”(DBCFT)取代企业所得税。由瑞安(Paul Ryan)议员与布拉迪(Kevin Brady)议员领导的众院共和党人还希望，将公司税率从目前的 35%降低到 20%，对其他企业，如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税率降低到 25%。另一个更好的办法，是以全新的 DBCFT 制度替代目前已经破旧的企业所得税，而不必削减税率。

美国目前的企业所得税对经济有害。这是几乎每个人都认同的，根据企业所得税制，企业不允许立即扣除全部投资成本，企业所得税抑制了资本投资，从而降低了美国工人的生产力和工资。企业所得税允许公司扣除利息，却不允许扣除股息支付额，这又激励了企业过多借贷，而不利于提高股本。

美国企业税制激励了税务倒置行为。联邦政府对全球所得征税，但同时却允许境外所得税推迟到资金汇回美国前征收，企业所得税刺激企业将生产、所得以及公司总部迁往国外。据经合组织(OECD)统计，企业所得税总体上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比个人所得税、工薪税或消费税更多。

降低企业所得税率会降低问题的严重性。那么为什么不降低 DBCFT 税率呢？把设计周到的 DBCFT 放在首位考虑，原因正是它可以避免当前企业所得税造成的问题。DBCFT 对货物和劳务征税、扣除生产成本，包括所有员工薪酬、新投资成本。目前，企业所得税只允许在数年内扣除资本投资，而 DBCFT 则不同，它不会对美国的资本投资、生产或工薪征税。DBCFT 不同于公司税的是，它不会过度补贴借款，也不会激励企业将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报告的利润或企业总部迁往国外。

这些正是 DBCFT 极好的特征。但也正是我们无需降低 DBCFT 税率的原因。现金流流转税不会产生企业所得税问题，不需要用较低税率解决问题，向 DBCFT 制度的改革已解决了上述问题。事实上，将现金流流转税率设定为 35%，而不是众院共和党人的 20%或 25%，这样做有几个优点。第一，如果企业税率降到 25%以下，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与企业税率就产

生了很大差距，促使纳税人将工资归入营业所得，进行减税。变低的企业税率会给往期投资的当期回报带来更大、低效和不公平的意外收益。第二，也许更重要的是，把税率保持在 35% 而不减少将大大增加税收收入，有助于减小长期财政赤字。众院共和党计划的企业税在未来 10 年内损失近 9000 亿美元财政收入。全部税改计划将损失 2~3 万亿美元财政收入，而将 DBCFT 税率保持在 35%，将会显著减少税收收入损失。事实上，DBCFT 的可贵之处在于，在不造成企业税收经济扭曲和效率低下情况下，筹集大笔税收收入。

有人可能会反对使边境调节税更难处理的 35% 税率。(边境调节税是 DBCFT 的一部分，功能上只对进口征税、对出口免税。)但是，很清楚的是，实施 DBCFT 制度，无论如何，都需对进口商进行过渡性减免。所以，实施 35% 的税率而不是 25% 或更低税率，只不过稍微延长了税改的过渡期。

在实施现金流转税之前还有其他重大问题和障碍需解决。然而，DBCFT 解决了企业所得税带来的许多问题。这既是考虑采用这项制度的原因，也是不降低现金流转税税率，实现有利的经济成果的原因。

(摘自 William G. Gale, The House GOP tax plan needs some tweaking, 布鲁金斯学会, 2017 年 2 月 24 日, 由李铃编译)

边境调节税在筹款委员中遇阻

众院筹款委员会中部分共和党委员对共和党税改纲要中的边境调节税方案忧心忡忡。这些参与了 2017 年 5 月 23 日筹款委员会听证程序的委员认为，边境调节税方案或将造成美国日常消费品价格上涨 20%，还有可能遭遇美国贸易伙伴的关税报复。

来自一些农业地区的共和党委员表达了担心。密西根州共和党委员鲍尔森 (Eric Paulsen) 最为直接，他明确表示不支持边境调节税方案。来自俄亥俄的共和党委员雷纳西 (Jim Renacci) 表示，对边境调节税持怀疑态度，他提及家乡一些企业，其中有家企业从事咖啡销售，且非常依赖进口咖啡豆。宾州共和党筹款委员会委员凯里 (Mike Kelly) 虽然没有明确批评边境调节税，但很关注它对消费品价格的影响，而且他是一名汽车经销商，所以很关注该方案对汽车零部件征税的复杂性的影响。南达科他州共和党筹款委员会委员诺伊姆 (Kristi Noem) 此前对这个纲要中对农业不允许扣除净利息的做法表示担忧，这次她又表示出对小型零售商的担心，其实农民和农场主也担心无法从边境调节税政策中获利。

筹款委员会主席布拉迪 (Kevin Brady) 作了解释。他说，筹款委员会认识到边境调节税方案是对现行税法的重大调整，所以，公众为美国的劳动者、企业和消费者感到担忧，十分合理。“我们承诺，将与所有的人共同解决这些难题。我们必须走好这步棋，我们定能走好这步棋”。

特朗普当局表明不接受目前形式的边境调节税方案。财政部长努钦 (Steven Mnuchin) 在 5 月 23 日的 Peter G. Peterson 财政政策峰会上，通过声明更强硬地指出：“边境调节税方案存在众多问题，其中之一是它无法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边境调节税方案对不同企业产生不同影响。它把高额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它导致货币资金发生转移。而我们所要做的是确保创造公平的环境”。

民主党委员对于边境调节税制颇不以为然。筹款委员会民主党资深委员尼尔 (Richard Neal) 在听证会上公开声明，呼吁全社会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具体包括修改税法或投资培养“训练有素的熟练劳动者”。Neal 建议 Brady 主席召开听证会，讨论如何在税改中有效地利用视同海外资金“遣返税”带来的收入。他说：“我建议用视同遣返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或用之于提高中产阶级生产与创造力。Neal 又说，边境调节税非常“有意思”，然而，国会必须

评估边境调节税是否会提高了普通美国人民的生活成本,因为零售企业表示,对消费者来说,食物、衣服、药品这类产品成本超过 1700 美元,而每加仑天然气价格也会上涨 35 美分。他说:“税制改革将会引起各种消费品价格上升,中产阶级家庭既不能、也不该为这一后果买单”。Neal 还提出了其他一些问题,他问:美元会强势上涨并抵消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吗?如果会的话,需要多长时间?这最终能够实现吗?鉴于目前货币币值波动,美元上涨的确定性有多大?美元上涨还会带来哪些影响?边境调节税是否符合 WTO 规则?美国是否存在遭受报复性行为的危险?

俄亥俄的共和党委员 Renacci 也提出了类似问题。即税改纲要中的边境调节税方案是否造成美国社会苦乐不均?税收负担最终又会转嫁到谁头上?税改与我国所承担的国际公约中的义务是否吻合?

《提升美国竞争力 防止美国就业机会向海外流失》听证会证言

听证会参与人员包括:

Archer Daniels Midland (ADM) 公司董事会主席、总裁、首席执行官: Juan Luciano

Target 公司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 Brian Cornell

沃尔玛美国前总裁、首席执行官: William Simon

Lindsey 集团总裁、首席执行官: Lawrence B. Lindsey

Reed 学院经济学教授: Kimberly Clausing, Thormund A. Miller 和 Walter Mintz

ADM 公司总裁 Luciano: 赞成边境调节税方案,因为这种体制能消除出口贸易税收差异,而出口贸易税收差异则源于美国税制和 OECD 国家边境调节增值税之间差异。“我们要致力于实现税收现代化,这样才能跟上其他国家的步伐。”Luciano 说道。

Target 公司首席执行官 Cornell: 边境调节税或将造成生活用品价格上涨 20%,例如校服、食品、药品和汽油,Tagret 公司的实际税率也将增加 1 倍多,从 35%提至 75%。他认同货币市场随边境调节税调整这一学术理论,但同时表示,“我无法告诉员工,他们的薪水变动与这个理想的理论符合,国会也不该告诉美国家庭,家计预算是否上涨”。Cornell 敦促 Brady 主席,暂时不要变革边境调节税,以尽快完成税制改革。

沃尔玛美国前总裁、首席执行官 Simon: 若边境调节税方案实施得当,并能解决零售商在过渡期内遭遇的挑战,解决产业问题必须进行的调整,则须考虑,我国实施边境调节税具有最佳利益。

Lindsey 集团总裁: 边境调节将导致货币流动调整,大大抵消税收,且使边境税收贸易中立,因此,在考虑到货币会调整的条件下,这项立法属于贸易中性。

Reed 学院经济学教授 Clausing: 有很多因素可能会干扰汇率和价格进行快速调整,有人预测,随着边境调节税制度推出,将导致美元升值 25%,导致美国人将大量财富转移至海外。她还表示,该提案有可能与 WTO 的贸易规则相矛盾,因为 WTO 不允许对企业所得税等直接税进行边境调节,但是由于边境调节税方案允许扣除工资,这将被视为直接税措施,如果那样的话,我国的贸易伙伴或将有权以关税施加报复。

提问与回答

加州共和党委员纽恩 (Devin Nunes) 提问可能的边境调节税阶段性实施方案。Lindsey 认为,边境调节税方案是极大的飞跃,但要解决各方担忧,方法之一是只进行部分变革,这要涉及进出口总额的 30%。他认为尝试着一步步来最好。对于 Renacci 委员的质疑,Lindsey 表示,他大力拥护阶段性实施边境调节税方案。

南达科他州共和党委员 Noem 提出了美国公司被外国企业收购问题。他特别关心的是农业，并询问边境调节税方案可以改变什么。Luciano 一方面感谢 Noem 议员在生物燃料与生物柴油领域的领导能力，另一方面他表示，共和党的税改纲要有助于提高农业竞争力和农民收入。

民主党的 Neal 委员怀疑边境调节税实施后是否伴随美元升值。对此 Cornell 重申了他对家庭基本必需品价格上涨影响的担忧，他引用了联储主席 Janet Yellen 等关于不确定性的评论。

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委员汤普森（Mike Thompson）也提了问题。Clausing 表示，目前美国贸易逆差是国会提出通过边境税收增加财政收入的思想根源，“但没有任何国家贸易永远是赤字”。美国最终会出现贸易顺差，所以纳税人将来会因边境调节税而亏损。Thompson 代表加利福尼亚州葡萄酒之乡询问 WTO 影响边境调节税的时间，他表示，任何有关贸易报复的讨论很快就会转为对美国出口葡萄酒的讨论。一旦 WTO 判定边境调节税属于直接税，那就违反了 WTO 贸易义务，Clausing 说，这会为贸易伙伴的报复大开绿灯。

华盛顿州民主党委员德尔宾（Suzan DelBene）转述了家乡小型酿酒厂的担忧。那里的酒厂使用的是进口原料，酒类却仅在国内销售，所以将面临边境调节税后成本增加，且没有任何抵扣。Clausing 说，由于汇率可能无法完美地调整，进口密集产业面临重大风险。她还表示，对数码产品更难观测，这对使用增值税的国家造成困扰，而这正是边境调节税计划尚未完全解决的几大问题之一。“另一大问题来自金融领域，由于根据该计划，金融行业必须区别对待，因此对如何管理金融行业税收造成了巨大困扰”。

加州民主党委员桑切兹（Linda Sanchez）关切国际税收改革的备选方案。Clausing 提出，可考虑消除递延或实施单一国别最低税额方案。

(摘自 Border adjustability concerns aired during Ways & Means hearing, *EY Tax Alerts*, May 25, 2017, 由文月、高丹翻译)

税收联合委员会调研边境调节税提案

税收联合委员会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 5 月 23 日举办的税收改革和拟议的边境调节税听证会前，发表报告对边境调节税加以概述。

报告首先提出了研究背景。众院共和党人于 2016 年 6 月份公布“更好的税改蓝图”，披露了进行个人税制与企业税制全面实施改革的立法预期。这个“蓝图”就包括了边境调节税方案。如果美国实施边境调节税制度，企业一般将不再允许基于实际进口成本进行扣除。此外，美国企业出口所得将不再征税。

报告的重点是提出边境调节税方案。首先该报告描述了国际税收的适用原则，概述美国现行跨境所得税收的法律。“税收以真正来源地为税基的国家，其税基包括在该国生产的商品和提供服务的销售收益，不论销售在哪里发生。相反，税收完全以目的地为税基的国家，其税基包括向位于该国采购商销售货物和提供服务的收益，无论货物和服务在哪里生产或提供”。这份报告这样解释。“美国的税收制度既不是完全基于来源地的税收，也不是完全基于目的地的税收。然而，由于在美国生产的货物、提供的服务，通常会被看作是美国税基的一部分，而无论该销售发生在哪里，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更多被认为是基于来源地税基的税收制度”。

报告描述了实施目的地税基的经济理由。有关目的地税基边境调节机制的经济分析指出，“一些决策者一直考虑建立一个以目的地为税基的税制，以此推广特定经济政策目标，并解决原先更多地倾向于来源地为税基的美国税收制度引发的问题”。

报告最后总结了向目的地税基转型的建议。

(摘自 Joint Committee Reviews Border Adjustment Tax Proposal, <http://news.cchgroup.com>, 2017 年 5 月 23 日, 由李铃、马樱梦编译)

边境调节税缺陷调整及意外后果

新一届共和党政府扬起了基本税制改革的希望。特别是在企业税制改革领域, 众院共和党税改专责小组蓝图已经展示了最具体、并与政治相关的计划要点。这个激进的计划要把原来的企业所得税转型为目的地税基现金流流转税 (即 DBCFT), 从根本上改革美国的企业税体制。按照这种新制度, 消费者将决定商业活动是否应纳税, 而不是由生产者地点决定。该计划还将通过豁免出口产品税、对进口商品重新征收 20% 税率的边境调节税 (BAT), 将税基调整为基于目的地征收。

在未来十年边境调节预计净增加 1 万多亿美元税收。这是由于在可预见的未来预计美国将出现贸易赤字, 众院共和党企业税制改革计划利用这笔财政收入降低税率, 否则就不会实现税收收入中性的税制改革。

对边境调节税需要进行研究。乔治梅森大学 Mercatus 中心的美国企业研究所所聘研究员菲尤哥 (Stan A. Veuger) 在项新的政策研究概要中, 讨论了边境调节税制转型及随之而来、意想不到的后果。Veuger 建议决策者要认识到 BAT 的缺陷, 并将现行企业税制与现实选择进行比较。

(摘自 Stan Veuger, Adjusting to the Border Adjustment Tax—Imperfections and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www.mercatus.org, 2017 年 3 月 16 日, 由李维佳编译)

《联储与货币政策》

众院新法案替代《2010 年多德-弗兰克法》

众院金融业委员会于 2017 年 5 月 4 日通过了 HR 10 议案。该法案以 34: 26 票通过该委员会, 彻底改写《2010 年多德-弗兰克 (Dodd-Frank) 金融改革法》。金融业委员会的亨萨林 (Jeb Hensarling) 主席长达 600 页、代表着“为投资者、消费者和企业家创造希望和机会”的《金融选择法案》(CHOICE) 将废除或广泛重组《2010 年多德-弗兰克法》的内容, 其中包括法案中在后危机时代制定的对银行资本的审慎规则; 授予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 (FSOC) 权力条款; 缩小 FDIC 权力的规定, 削弱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规定; 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CFPB) 的结构与任务; 以及许多其他影响联储、证券交易委员会等其他监管机构的规定。在为期三天的法案逐项通过过程中, 金融业委员会拒绝了民主党人针对 CHOICE 法案各部分的 19 条修正案, 只批准了 Hensarling 主席提出文本的替代修正案。该修正案包括金融业委员会于 2016 年 9 月国会最终通过的版本中进行的修改和增加的内容。

HR10 法案在众院的命运不确定。HR10 法案在 5 月早些时候送达众院全体会, 法案的许多规定可能会受到参院民主党的议事阻挠程序, 参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克拉波 (Mike Crapo) 迄今仍对修改《2010 年多德-弗兰克法》奉行不同做法, 他与资深议员布朗 (Sherrod Brown) 合作, 在两党支持下推动改革。在 HR10 议案中有一些要素, 如对《2010 年多德-弗兰克法》规定有序清算机构的废除, 可能被包含在只需 51 票就能在参院获得通过的预算和解法案中, 尽管一些狭隘的和解规定可能会破坏该法案的其他规定。财政部长努钦 (Steven Mnuchin)

也在编制关于变更财政监管规定的建议，并在 6 月份提交白宫，以完成特朗普总统 2 月 3 日行政令要求。上述都可能列入参院法案或参众两院的金融改革会议。

Hensarling 主席在会议开幕式上发言。他指出：“在《2010 年多德·弗兰克法》通过后，美国人民得到了提振经济的承诺。然而，与之相反，通过立法之后，我们却经历了一生中最慢、最微弱的经济复苏。我们得到承诺，《2010 年多德·弗兰克法》最终会结束对大公司的紧急援助。可是恰恰相反，《2010 年多德·弗兰克法》给华尔街银行家承诺了更多来自纳税人资金的援助，非民选的官僚法令太宽泛从而导致了失败……我们委员会从许多社区银行和信贷联盟领导那里得知，《2010 年多德·弗兰克法》对普通老百姓是真正伤害”。

民主党委员的对立情绪则更大。来自加州的资深民主党委员玛克辛·沃特斯（Maxine Waters）说：“错误的《金融选择法案》是特朗普摆脱金融监管、助力华尔街的工具……该法案破坏了华尔街的改革，毁坏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还造成冒险和掠夺成性的华尔街金融体系，通过他们的行为和产品破坏我国经济。这是对另一次大衰退的邀请函，或者比这个更加糟糕……这个法案糟透了，而且，它只是为特朗普和他的华尔街伙伴们服务的。该法案在抵达参院前就会终结，它没有机会成为法律”。

（摘自 House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ttee advances CHOICE Act repealing major elements of 2010 Dodd-Frank Act, *EY Tax Alerts*, 2017 年 5 月 8 日，由李维佳编译）

联储在空中盲飞

联储货币政策制定者应感到高兴。他们成功地、超预想地降低了失业率，却没有引起通货膨胀爆发。目前股指接近历史高点，利率维持在低位。

但是那些设定利率的人却很尴尬。他们不明白情况怎么会变得这么好，因此，他们对下一步该做什么感到很困惑。来自多伦多的资产管理公司 Gluskin Sheff + Associates 首席策略师罗森博格（David Rosenberg）说：“联储不是由电脑、而是由肉身的人运营的。他们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也有缺点、也有盲点”。2017 年 6 月 14 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投票决定，再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 0.25 个百分点，达到 1%~1.25% 区间。该机构表示，预计通货膨胀率将升至“中期”目标值 2%。

尽管 5 月份失业率下降到只有 4.3%，而通胀率仍在 2% 以下。对于联储主席耶伦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来说，仍不清楚这是为什么，现在甚至有前科的犯人、高中辍学者都找到了工作，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工资必然上涨的不可避免的原因之一。由企业支持的研究小组“经济咨询局”首席经济学家戈阿（Gad Levanon Ga）指出：“如果供小于求，价格就会上涨”。然而，就业市场紧绷并没有导致通胀。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是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该指数从一年前到 4 月份，仅上升 1.7%。在 6 月 14 日联储会议召开时，美国劳工统计局宣布，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消费价格指数在 5 月份只上涨了 0.1%，这是 3 个月内第三最低数据。

市场对耶伦的困境深表同情。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费罗里（Michael Feroli）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前说，耶伦依赖菲利普斯曲线，而菲利普斯曲线认为，低失业率导致高通胀。他说：“这是对我国经济的最好描述”。不过，Feroli 也搞不清低到莫名其妙的 CPI 数据，他说：“菲利普斯太过热情”。一些经济学家担心，联储上调利率将通过增加信用卡、汽车贷款、大学生贷款及企业贷款成本传递，使经济骤然降温。Rosenberg 比大多数经济学家更悲观，他指出，联储 13 次提高利率过程中发生了 10 次经济衰退，所以美国将在未来 12 个月内陷入衰退。但迄今为止，几乎没有证据显示经济遭遇压力。事实上，包括股票、债券、货币的高盛金融状况指数显示，经济情况与联储在 2015 年底加息前不久一样，有利于美国经济。

但风险也可能被隐藏起来了。Whalen Global 咨询公司主席维纶（Christopher Whalen）说，

如果利率过高，在长期信贷过多、债务太多的借款人，可能面临偿还或再融资困难，联储几年前本该收紧信贷，但现在不能这样做，以避免触发违约潮，“我想他们被‘卡住了’，他们把自己关在里面了”。

特朗普总统还要填补联邦储备委员会 3 名委员空缺。目前该委员会有 4 名委员，如果耶伦和斯坦利·菲舍尔任期结束后分别放弃董事会主席、副主席席位，明年将再多出 2 个委员空缺职位。目前耶伦最不想做的事就是因胡乱摸索而载入史册。

（摘自 Peter Coy, The Fed Is Flying Blind, <https://www.bloomberg.com/authors/APxGZmxEsLk/peter-coy>, 2017 年 6 月 14 日，由李维佳编译）

日本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启示

日本央行管理体制更迭使其货币政策试验重新受到关注。2016 年 9 月 21 日日本央行发布了公告，题为《强化货币宽松的新框架：控制收益曲线的量化与质化货币宽松》。首先，日本央行曾承诺通胀目标要超过 2%。其次，日本央行不仅要控制短期利率，也将影响长期利率。与日本央行之前购入一定数量债券的承诺相反，它将购入尽可能多国债，使日本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维持在目前 0% 左右水平。布鲁金斯学会哈钦斯中心从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到访中，嗅到了日本央行管理体制变更的气息，发现有五个问题需要回答：

第一，最近日本央行管理体制变化是否意味着宽松逐渐减少？金融市场上有人说，新的管理体制变革推动宽松政策“减量”，声称通过承诺购买一定数量国债，日本央行正在收缩购买量，其本质是收紧货币政策。黑田行长驳斥了这种猜测。

第二，在日本央行试验性举措后，银行业表现如何？银行盈利能力的下降引起了市场对央行政策试验的关心，自日本央行 2016 年 1 月实行负利率以来，拉开了一系列货币政策试验。黑田行长承认，银行盈利存在压力，但负利率并不影响（还未影响到）日本经济增长。

第三，日本银行已经弹尽粮绝了吗？作为发达经济体，日本短期利率已接近于 0，央行内外主要关心是否还有应对经济衰退的其他方法。黑田行长表示，日本央行相信 -0.1% 的短期利率以及 0% 的 10 年期国债利率，目前是合理的，但如果经济数据令人失望，央行还有采取更多行动的空间。

第四，日本央行是否采取更多扩张性财政政策？日本政府数十年来的财政赤字与缓慢的经济增长，推动了政府负债与 GDP 比值高达 243%（属全球最高）。这引发了对日本长期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并暗示着财政部门刺激经济的空间很小。黑田行长承认，通过承诺购买无限量国债，避免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日本央行可能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然而，他排除了财政与货币机构合作“坐直升机撒钱”的手法，目前不可能让央行独立。

第五，日本央行的非传统货币政策给世界各国什么启示？联储前副主席、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布兰德尔（Alan Blinder）认为，日本与欧洲的负利率政策所起作用比预期小。

我认为，迄今为止我们发现，负利率既不太糟，也不那么好……我只承认，他们应当比迄今为止所做更多……另外，不仅与日本有关，即是否有部分原因使央行更善于将通胀压低。课堂知识只是给学生提供了看世界的方式。

黑田行长以日本经济经验给世界上两堂课。即既要避免长期经济危机，又要避免通缩。

（摘自 David Wessel, Anna Malinovskaya, 5 questions about the Bank of Japan's regime change, 布鲁斯金学会, 2016 年 10 月 20 日，由田甜编译）

《美国财经数据》

两成美国人忧心经济恶化

据最新盖洛普民意测验，30%的美国人评价国内经济“优秀”或“良好”，有2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经济“很糟糕”。当然，答案取决于受访者的具体情况，正如盖洛普所指出的，如他是一名共和党人还是一名民主党人。但事实到底如何？我的答案如下。

2017年的美国经济不同于2009年，也不像2013年。美国经济终于从大衰退中恢复过来。失业率低至4.7%。工资涨幅最终跑赢了通胀。房价回到了经济泡沫破裂前的水平。汽车销量不断打破纪录。消费者信心也在飙升。美国经济现在并不需要大幅减税、增加开支等财政刺激手段。事实上，如果国会继续加快步伐推行减税，增加支出，那么联储加息速度可能超出计划。

但美国经济形势也并非一片大好。很多长期问题依然存在，例如，太多的工人仍在观望；15%的青壮年男性没有工作（25~54岁，比学生年长但距离退休又还远）。近期尽管那些有工作的人数略有增加，但工资多年停滞；据统计，全职男性员工每周赚920美元，经通胀调整后与1986年同等职位赚的差不多。斯坦福经济学家切蒂（Raj Chetty）新近发现，出生于1940年代早期的孩子，有90%的最终收入高于父母（经通胀调整后），但1980年代早期出生的孩子，只有50%的最终收入高于父母，这种现象更多地与因经济增长而日益增加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关，而与放缓的经济增速无关。不过，经济增速放缓依然令人担忧。生产力（单位小时产量）增长很慢。在以往10年的美好时代（1995~2004年），生产力增速快到足以在每25或30年内将生活质量提高一倍，基本上正好是一代人。而现在，生活质量想要提高一倍，则需要花费70年时间。

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该做的有很多。这里有一些想法。

我们终有一天会再次面对经济衰退。对此应做好充分准备。在很长时间内，利率都会低于历史平均水平，联储不会像上次经济衰退时那样降息了。这给税收和支出带来了更多负担。第一种不产生任何危害的政策措施是，国会应当关注自动稳定器，那么当经济下行，收入下滑时，所得与支出项目就会自动扩大，如失业补助或是医疗补助。

幸运的是似乎暂时还看不到经济衰退的迹象。因此，当下正是专注解决长期问题的好时机。我国应努力通过大学教育，提高学前教育质量，并加大教育研发投入。应更多投资于低收入家庭儿童项目，因为他们未来都是劳动者。还应使工作更具吸引力，以此鼓励扩大就业，包括提供资金补助。应通过鼓励私人投资、增加公共投资、改进教育和职工培训，提高劳动质量，促进竞争，从而更多地激励生产力增长。

最后要预测联邦债务发展。预计联邦债务在很大程度上会继续上升，因为我国是个老龄化社会，考虑到存在低利率形势，这并不紧迫。但我们永远不能遗忘这一点，应当警惕更深的经济陷阱，除非我们有信心在未来还清投资借款。

（摘自 David Wessel, Three things to tackle now before the economy's next slump, 布鲁斯金学会, 2017年1月9日, 由田甜编译）

美联邦政府2017年7月预算回顾

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估计，**联邦政府2017财年前十个月预算赤字5680亿美元**，同比增加560亿美元赤字。联邦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都高于去年同期，但是，其中财政支出

增加更多。如果去除部分财政支出在周末而提前支付发生变动的的影响，前十个月财政赤字应比去年同期增加 980 亿美元。

CBO 在最新预算规划中估计，2017 财年财政赤字达 6930 亿美元，同比 2016 财年，财政赤字则为 5850 亿美元。预计数据公布于 2017 年 6 月的《预算与经济展望：2017~2027》报告（更新版）。

表 1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7 月预算总额

单位：10 亿美元	2016 财年（实际）	2017 财年（预计）	估计变动
财政收入	2679	2738	60
财政支出	3191	3307	116
赤字（-）	-512	-568	-56

数据来源：CBO；美国财政部。根据 2017 年 6 月《财政部月报》以及 2017 年 7 月《财政部日报》汇总。

一、 财政总收入：2017 财年前十个月增加 2%

据 CBO 估计，2017 财年前十个月的财政总收入为 27380 亿美元，去年同比增加 600 亿美元。2016~2017 年主要变化如下：

1、个人所得税与工薪（社会保险）税收入共增加 850 亿美元，增幅为 4%。

（1）代扣的工薪税收入共增加 1060 亿美元，增幅为 6%。这个变化主要反映了工资和薪水的增长。

（2）非代扣工薪税收减少 100 亿美元，降幅为 2%。部分降幅出现在 4 月，截至 4 月纳税人最终完成了 2016 年应缴税金，低于 2015 年。

（3）个人所得税退税增加 110 亿美元，增幅为 4%，进一步减少了财政净收入。

2、从联储汇入财政部汇款（包含在表2包其他”收入类目下）减少300亿美元，这主要是因为《2016财年修复美国地面运输法案》（第114-94号公法）要求联储将盈余账户大部分资金汇入国库。这家中央银行在2015年12月一次性汇出款项190亿美元。此外，短期利率提高增加了中央银行对存款机构储备金支付的利息，这样又减少了2017年汇款。

3、收费和罚款增加 50 亿美元，部分原因是今年的罚款额超过平时。

4、公司所得税收入增加不到 10 亿美元。

表 2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7 月财政收入表

主要来源（10 亿美元）	2016 财年（实际）	2017 财年（预计）	估计变动幅度	
			金额	百分比（%）
个人所得税	1271	1313	42	3.3
工薪税	933	976	43	4.6
公司所得税	232	232	*	0.2
其他	243	217	-25	-10.5
合计	2679	2738	60	2.2
备注：个人所得税与工薪税				
代扣税收	1888	1994	106	5.6
其他，净退税	317	295	-21	-6.7
合计	2204	2289	85	3.8

数据来源：CBO；财政部。

注：* = 少于 5 亿美元

二、 财政总支出：2017 财年前十个月上涨 4%

据CBO估计，2017财年前十个月财政支出总计33070亿美元，去年同比增加1160亿美元。如果不考虑部分支付从2016年10月提前到9月变动的的影响，财政支出实际增加1570亿美元，增幅为5%。下面的讨论反映了剔除支付时间变动影响后的调整数字。

增长最多的支出项目如下：

1、 三大强制支出项目合计增长410亿美元，增幅为3%。

(1) **社会保障福利**支出增加240亿美元，增幅为3%，这反映了在受益人人方面和平均保险支付额方面近期都出现典型增长。

(2) **医疗保险**支出增加150亿美元，增幅为3%，这反映了受益人人方面和向受益人提供的服务数量与成本都有所增加。

(3) **医疗补助计划**支出增加30亿美元，增幅为1%，部分原因在于《平价医疗法》扩大了医保覆盖面，参保人数增加。

2、**教育部**支出（包含在表3“其他”类目下）增加310亿美元，增幅为48%。因为教育部上调了往年发布的贷款和贷款担保估计净补贴成本，上调数值约390亿美元，远远高于2016年上调的70亿美元。如果去除这些调整的影响，教育部2017财年前十个月支出应减少20亿美元，降幅为3%。

3、**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支出（包含在表3“其他”类目下）增加290亿美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在2017年6月上调了贷款和贷款担保的估计净补贴成本，而在2016年4月则是下调了。

4、**公债净利息**支出增加250亿美元，增幅为11%，很大原因在于通胀率变化。考虑到通胀因素，财政部每月依据前两个月城市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动，调整通胀保值债券本金。2016财年前十个月调整数总计115亿美元，然而，2017财年调整数总计325亿美元。

下面这些支出包含在表3“其他”类目下，有关项目也显著增长：

1、**退伍军人事务部**支出增加90亿美元，部分原因在于领取伤残补偿金的退伍军人人数、支付的补偿金数额都有典型增长，其他部分原因在于通过“退伍军人医疗选择计划”而获得医疗福利的退伍军人人数持续增加。

2、**联邦通讯委员会**拍卖的电磁波谱使用许可证支付，减少80亿美元收入。因为拍卖收入在预算中登记为抵消收入（也就是说，减少支出），而拍卖收入减少导致支出更高。

有一个项目的预算支出显著下降，即政府从“房利美”和“房地美”收到的支付比去年增加130亿美元，这两家企业在2016年12月、2017年3月与6月向财政部汇出季度性汇款。这些收入（包含在表3“其他”类目下）被登记为对支出的抵消，因此使净支出减少。

其他项目和活动支出变化不大。

表3 2016年10月~2017年7月财政支出表

主要支出（10亿美元）	2016 财年（实际）	2017 财年（预计）	变动值	调整后变动幅度 ^a	
				金额	百分比（%）
社会保障福利	753	776	24	24	3.1
医疗保险 ^b	469	462	-7	15	3.1
医疗补助计划	306	309	3	3	1.0
小计（金额最大的强制支出项目）	1528	1548	20	41	2.7
国防部-军队 ^c	462	465	3	7	1.4
公债净利息	236	261	25	25	10.6

其他	965	1034	68	84	8.7
合计	3191	3307	116	157	4.9

数据来源：CBO；财政部。

注释：

- 调整数剔除了因节假日提前支付的影响，2017 财年前 10 个月支出调整后应为 33480 亿美元。
- 医疗保险支出是抵减收入后的净额
- 剔除了国防部在民用项目上的开支

三、2017 年 7 月赤字估计：450 亿美元

据 CBO 估计，联邦政府在 2017 年 7 月发生财政赤字 450 亿美元，比去年 7 月减少 680 亿美元。因为，2017 年 7 月 1 日为周末，部分支出提前到了 6 月份记账，如果去除这个支出变动的影响，7 月份实际财政赤字应比估计数值减少约 240 亿美元。

据 CBO 估计，2017 年 7 月财政收入总计为 2310 亿美元，比去年 7 月增加 210 亿美元，增幅为 10%。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代扣个人所得税和工薪税大幅增加，共增加 170 亿美元，增幅为 10%，这个增长反映了工资和薪水的增加。财政收入增长的另一个原因是 2017 年 7 月比 2016 年 7 月多出 1 个星期一，并且星期一代扣税金明显多于一周中其他日子。

表 4 2017 年 7 月预算收支表

单位：10 亿美元	2016 财年（实际）	2017 财年（预计）	变动值	调整后变动幅度 ^a	
				金额	百分比(%)
财政收入	210	231	21	21	9.8
财政支出	323	276	-47	-3	-1.1
赤字	-113	-45	68	24	-21.3

数据来源：CBO；财政部，

注释：

- 调整数剔除了提前支付部分支出的影响，据 CBO 估计，调整后，2017 年 7 月的赤字应为 890 亿美元。

据 CBO 估计，2017 年 7 月共计财政支出 2760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470 亿美元。部分支出增长源于今年 7 月的支出提前到了 6 月，如果去除支出变动的影响，财政支出应只比去年减少 30 亿美元。（下面讨论的变化是基于剔除提前支付变动后的调整值。）

财政支出变化较大的项目如下：

1、**社会保障福利**支出增加 20 亿美元。

2、**医疗保险**支出减少 30 亿美元，因为通常在 7 月份对“医疗保险优惠计划”（Medicare Advantage Plans，也称“医疗保险 C 计划”）核对款项，今年则推迟到了 8 月份。（核对款项工作是指每年对上个自然年度非预计支出增加情况进行说明。）

其他项目和活动支出变化不大。

四、2017 年 6 月实际财政赤字为：900 亿美元

财政部报道 6 月发生财政赤字 900 亿美元，比上月 CBO 估计值多出 30 亿美元。

（摘自 CBO, *Monthly Budget Review for July 2017*, CBO, 2017 年 8 月 7 日，由龚德昱编译）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7 年第 8 期内容完]

2017 年 8 月 8 日截稿

2017 年 8 月 25 日于上海出版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 Governance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是上海市教委重点建设的十大高校智库之一，主要为加快学术成果应用转化、服务政府决策和社会需要服务。

美国财政与经济研究所

The American Fiscal Studies Institution

美国财政与经济研究所以学术创新为导向，整合校内外有关美国政治经济研究资源，专注于美国财政、税收、货币、金融、科技与产业政策等财经专门领域相关理论、实践问题研究。



智库视野



研究院微信

研究院微博



主办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

上海市国定路 777 号

邮政编码: 200433

电话: (021) 6590 8706

138 167 45845 (潘洁)

官方微博: e.weibo.com/u/3932265304

协办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地方税务局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万盛街 8 号圆融大厦

邮政编码: 215028

电话: (0512) 6696 2121

美国财政与经济研究所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编辑部

电话: (021) 6590 3457 / 159 219 91883

邮箱: mcdm@mail.shufe.edu.cn